

与时俱进的统一大市场： 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效应*

钟粤俊 奚锡灿 陆 铭

内容提要：随着生产性服务业赋能作用的增强，统一大市场建设日益重要。本文构建了包含四部门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要素和产品市场一体化的不同模式对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着重关注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效应——投入产出结构变化和部门关联效应。本文发现，市场一体化的收益会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而扩大，其核心机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效应由弱变强。具体而言，投入产出结构变化主要影响产业结构调整，部门关联效应主要影响增长和社会福利。量化分析表明，区域一体化和全国一体化均会增加全国GDP和社会福利，并有效推进结构转型和区域间分工进一步深化。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生产性服务业赋能作用的增强，全国一体化带来的结构转型、经济增长和福利提升效应将超过区域一体化带来的提升效应。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随着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应当更加重视从区域一体化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纵深推进。

关键词：统一大市场 结构转型 生产性服务业 赋能效应

一、引言

加快商品和生产要素统一大市场^①建设，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2022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前提下，优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工作”。2025年7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从建设统一大市场的举措来看，我国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改革方式，从区域一体化逐步向全国一体化推进。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循序渐进的改革是务实的，但有关一体化改革进程的经济理论分析却相对滞后。值得我们关心的问题

* 钟粤俊，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邮政编码：200062，电子信箱：yuejunzhong1@gmail.com；奚锡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邮政编码：200433，电子信箱：xicanxi@fudan.edu.cn；陆铭（通讯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发展研究院，邮政编码：200030，电子信箱：luming1973@sjtu.edu.cn。本文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7234203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2403088）、上海市2025年度软科学研究项目（25692111500）、2025年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国际传播与发表项目（2025ECNU-GJCBLW006）和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基金（202207）的资助。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特别感谢李杰伟、向宽虎、唐为、陈强远、梁文泉、韩立彬、苏东灵、钟辉勇、刘修岩、杨光等在研究中提供的帮助和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① 本文不对市场一体化和统一大市场进行区分，二者会依据不同的上下文需要而出现或替换。

是:市场一体化建设对区域协调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将产生什么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逐步呈现后工业化的特征,为什么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越来越重要?

本文认为,理解渐进式一体化改革的关键在于厘清不同发展阶段下生产性服务业赋能效应的差异,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中间品投入结构,即生产性服务业在投入产出网络中的重要性;二是部门关联效应,即生产性服务业对其他部门发展的影响。在经济发展早期,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效应较弱,表现为在投入产出网络中的重要性、对其他部门发展的影响均较小。此时,一些核心地区或大城市的跨区域产业关联性或辐射效应较弱,区域(如省际和城市群)一体化就可以推动实现地区间产业融合发展。然而,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升级和分工深化,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效应在不断增强。例如,与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制造产品相比,高技术制造业产品往往需要大量前端产品研发和后端品牌营销的服务业投入,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大幅增强。^①同时,相比于制造业部门,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更集聚,核心地区或大城市的优势会因为生产性服务业赋能效应的增强而强化。此时,虽然区域内一体化收益仍在,但是全国一体化对增长和转型等收益的推动作用在扩大。因此,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产品和要素的全国市场一体化改革的重要性越来越高,未来将更有利于强化区域间分工,并产生更大的效率和福利改进。

本文基于空间视角,研究产品和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如何影响产业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②具体地,本文构建了包含多地区、四部门、非位似偏好和规模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定量分析区域一体化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结构转型、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等的影响。^③量化分析发现:首先,市场一体化建设会增加实际GDP和社会福利,能有效推进结构转型。在建设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区域间分工将持续深化,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会进一步向服务业转型。其次,比较了区域一体化和全国一体化的结构转型与福利变化差异,从不同维度剖析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效应:生产的中间品投入产出结构变化主要影响结构转型,部门关联主要影响增长和社会福利变化。具体地,如果区域内(或全国)的迁移成本下降25%或产

^① 可以类似分析需求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个体会越来越多地消费服务业和偏好多样性(钟粤俊等,2020,2024)。由于全国一体化带来经济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升效应更大,更能满足人们对消费多样性的需求,从区域一体化向全国一体化过渡的好处在加大。在经济发展早期,人们的消费需求简单,区域一体化基本能满足这些消费需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偏好多样性消费,消费需求增多的同时也更加个性化。

^② 需要说明的是,市场一体化建设同时包括破除商品和要素流通壁垒、税收协调、交通设施的联通接轨、产业政策的协调分工等,本文聚焦于劳动要素和产品市场一体化。

^③ 量化空间模型(Quantitative Spatial Model)是研究要素空间配置和相关政策(如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分析工具。该模型能够有效实现理论与数据的有机结合,并捕捉政策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的综合效应,因而常用于对各类政策进行反事实模拟分析(陈斌开和赵扶扬,2023;Ferrari & Ossa,2023;林晨和李宇潇,2024;Lu et al.,2025)。这一方法尤其适用于像中国这样存在区域间异质性的国家。近年来,国内外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使用这一方法分析中国问题(如Tombe & Zhu,2019;Hao et al.,2020;Henderson et al.,2022;陈斌开和赵扶扬,2023;钟粤俊等,2023;林晨和李宇潇,2024;Lu et al.,2025;赵扶扬等,2025)。

品贸易成本下降20%(本文将此定义为与基准分析相同的一体化改革),在服务业赋能效应较弱的阶段,一体化改革的收益主要由区域一体化驱动。例如,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改革中,区域一体化产生的结构转型和福利收益约为全国一体化的2/3。然而,随着服务业赋能效应的增加,与基准分析相同的一体化改革所产生的增长、福利和结构转型效应变大,且全国一体化改革产生的收益效应提升超过区域一体化。最后,随着发展水平的提升,与基准分析相同的一体化改革能产生更大的增长和结构转型效应,且全国一体化改革效应提升更快。尽管从改革难度来看,区域一体化障碍较低,率先推进比较容易,但由于市场一体化建设的收益随着发展阶段而不断扩大,未来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日益重要。本文的理论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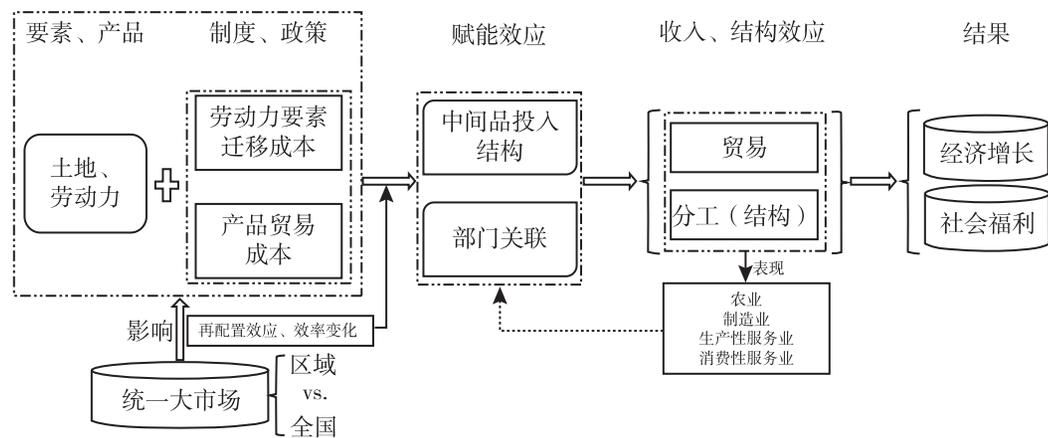


图1 理论逻辑关系

同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三类。第一类是与统一大市场相关的文献,^①户籍制度、市场分割(要素、商品、技术等)、低效率补贴和扭曲等均是阻碍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主要因素。近年来,诸多文献探讨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福利、贸易、环境和区域发展或竞争的影响(Tombe & Zhu, 2019; 陈朴等, 2021; 陈斌开和赵扶扬, 2023; 钟粤俊等, 2023; 林晨和李宇潇, 2024; 赵扶扬等, 2025)。^②研究发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利于减少错配或扭曲,促进经济增长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Tombe & Zhu, 2019; Hao et al., 2020; 陈朴等, 2021; 周慧珺等, 2022),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降低区域间和城乡间的不平等(Hao et al., 2020; 钟粤俊等, 2023; 程宇丹等, 2024; 钟粤俊等, 2024)。然而,鲜有研究基于空间一般均衡模

① 学术界对中国统一大市场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对中国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现象的讨论。

② 一部分讨论产品市场分割及其影响的研究指出,产品市场一体化程度和行政边界制度性摩擦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陆铭和陈钊, 2009; 陈朴等, 2021; 李自若等, 2022; Zheng et al., 2022; 才国伟等, 2023; 钟粤俊等, 2023, 2024)。另一部分讨论要素市场分割及其影响的研究指出,中国在土地(陆铭等, 2015; 程宇丹等, 2024; 钟粤俊等, 2024; Lu et al., 2025)、劳动力(Tombe & Zhu, 2019; Hao et al., 2020; 周慧珺等, 2022; 钟粤俊等, 2023; 蒋为等, 2024)和资本(Hsieh & Klenow, 2009; 陈诗一等, 2019; 尹恒和李世刚, 2019; Hao et al., 2020; Henderson et al., 2022; 吴涵和郭凯明, 2023; 赵扶扬等, 2025)等要素市场上存在扭曲,这些扭曲会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

型评估统一大市场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也没有研究同时评估统一大市场建设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效应,以及评估经济发展阶段对一体化改革效应的影响。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空白,区分区域一体化和全国一体化的影响差异,并揭示生产性服务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第二类是与结构转型相关的文献。研究指出,生产要素空间配置效率会带来国家或地区间的生产率和人均产出差异(Banerjee & Duflo, 2005; Adamopoulos et al., 2022; 陆铭等, 2023),从而影响产业结构转型(陆铭等, 2023; 钟粤俊, 2024)。中国也存在生产要素的空间低效配置问题(Tombe & Zhu, 2019; Hao et al., 2020; 钟粤俊等, 2020; 陆铭等, 2023; 钟粤俊等, 2024),这些扭曲或障碍不利于推进产业结构转型(Rogerson, 2008; Hao et al., 2020; 徐朝阳和张斌, 2020; Adamopoulos et al., 2022; 钟粤俊等, 2023, 2024)。此外,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际贸易也会通过改变比较优势从而影响产业结构(Caliendo & Parro, 2015; Tombe & Zhu, 2019; Caliendo et al., 2021; 吴涵和郭凯明, 2023; Lu et al., 2025)。^①本文同时考虑非位似偏好效应和规模经济对结构转型的影响,重点探讨一体化建设对商品部门向服务业部门转型的影响和对地区分工的影响,丰富了结构转型的相关文献。^②

第三类是与产业关联和赋能效应相关的文献。研究指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会带来制造业部门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上升、经济增长(Gagnon, 2007; Francois & Woerz, 2008; Burstein & Vogel, 2010; 李平等, 2017; 韩峰和阳立高, 2020; 张群等, 2025),因为生产性服务业能够提高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运营效率、经营规模,并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集聚等促进经济增长、制造业发展和社会分工(刘志彪, 2001; 郑吉昌, 2005; 李平等, 2017)。然而,鲜有研究从市场一体化的空间视角系统分析产业关联和赋能效应,^③本文丰富了这一文献,从多维度剖析生产性服务业部门赋能效应的影响机制。同时,本文比较不同发展阶段下一体化的影响,随着经济发展和生产性服务业赋能效应的提升,一体化改革所产生的增长和结构转型效应会发生变化。本文能够为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纵深推进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证依据。

本文余下内容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制度背景和特征事实分析;第三部分构建了包含非位似偏好、生产规模经济和上下游产业联系等的空间一般均衡模

^① 其逻辑是,在开放经济下,消除要素市场扭曲会改变要素成本和产业比较优势,进而改变贸易结构和渠道,并影响产业结构。

^② 一体化改革有利于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同时提升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占比和产出占比。现有研究认为,当前中国制造业份额下降的同时仍属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国家,制造业份额下降具有“早熟”性质(魏后凯和王颂吉, 2019)。其实,从跨国比较来看,中国比发达国家历史同期的制造业GDP比重更高、制造业就业比重相似,而服务业比重更低(钟粤俊等, 2020; 钟粤俊, 2024)。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体化改革降低体制性障碍后,大量人口从农村进入城镇非农部门就业(中国与发达国家历史同期相比,农业GDP比重相似、但就业比重高10个百分点),同时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比重,且服务业比重上升更快。

^③ 也有研究基于量化分析方法讨论产业关联效应,探讨中间投入是否促进部门发展、经济增长及其作用机制。例如, Caliendo & Parro (2015) 基于美加墨的跨国分析,构建包含中间投入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产品市场一体化建设会带来福利提升; Caliendo et al. (2021) 基于欧盟区扩大的冲击,量化分析产品和要素市场一体化建设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均是基于跨国的一体化建设分析,且没有考虑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效应。

型;第四部分进行量化分析,包括参数校准和反事实分析,对区域一体化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效应进行比较,讨论服务业赋能效应对不同类型一体化改革的影响;第五部分为进一步拓展分析;第六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制度背景与特征事实

(一)市场一体化建设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各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差距大,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互补性强,迫切需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①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内循环的关键堵点。202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时指出,要增强一体化意识,必须从体制机制上打破地区分割和行政壁垒,为一体化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同时是一项系统工程和艰巨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意见》提出,鼓励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以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区域,^②在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前提下,优先开展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工作。区域一体化建设有利于削弱或消除区域内的贸易壁垒、行政壁垒等,使生产要素趋于自由流动,将有助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进程。

《意见》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从区域一体化逐步向全国一体化过渡。与《意见》一致,本文对“区域”的定义如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作为五大区域,其他区域均以省级单位作为区域一体化的单元。^③

(二)产业部门与结构转型

本文根据国际标准行业分类体系(ISIC)划分三大产业部门。^④根据《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和《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将服务业进一步划分为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或生活性服务业)。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为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与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等,具有专业化程度高的特点,其发展有利于现代制造业与服务融合;其他为消费性服务业(包括公共服务业),需要面对面的接触交流,其发展更依赖于本地市场的规模效应。

图2描绘了1990—2021年中国各部门GDP和就业份额的变化趋势。1990年以

① 2015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坚决清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各种路障”,明确提出“统一大市场”这一概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二十大报告、“十四五”规划纲要、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等均提及“统一大市场”,并提出了具体的发展要求。

② 其中,京津冀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长三角包括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和安徽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包括重庆市和四川省;长江中游城市群主要包括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

③ 因篇幅限制,基于规划城市群一体化建设的分析结果参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其量化分析的结论与基准分析类似。此外,一体化改革的关键是人口要素和产品流动及其演变,人口流动和产品贸易的动态空间配置及其变化等特征事实也参见附录。这些讨论为后文量化分析中引入人口流动和商品贸易提供了依据。

④ 类似划分的有: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Herrendorf et al.(2014);钟粤俊等(2020,2023)。

来,农业部门占GDP和就业份额逐年下降,服务业部门占GDP和就业份额逐年上升,制造业部门占GDP和就业份额先升后降。对服务业部门进一步细分,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业部门该份额均呈上升趋势,但消费性服务业部门的波动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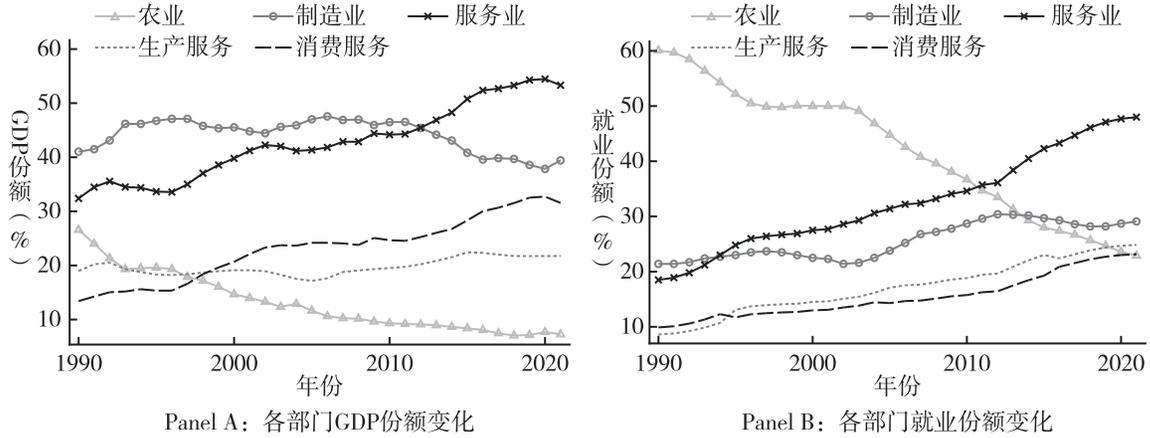


图2 各部门占GDP和就业份额变化

数据来源:《2022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1》;第五一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第一产业(农业部门)是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农林牧渔服务业;第二产业(制造业部门)是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其他是第三产业(服务业部门)。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

(三)部门投入—产出关系

本文关注的赋能效应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中间品投入结构,故本部分给出部门投入—产出关系的特征事实。首先,不同部门的中间投入占生产总投入的份额均较高且稳定。根据2005—2020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表1给出各部门生产时所用的中间投入要素占总投入比重变化,其中农业部门约40%,制造业部门超过70%,生产性服务业部门接近50%,消费性服务业部门约45%。因此,理论模型和量化分析需要考虑中间投入对生产的影响。

表1 各部门中间投入使用占总投入的份额

年份	<i>a</i>	<i>m</i>	<i>ps</i>	<i>cs</i>
2005	0.4135	0.7480	0.5282	0.4895
2007	0.4138	0.7671	0.4545	0.4770
2010	0.4153	0.7783	0.4631	0.4334
2012	0.4145	0.7707	0.4816	0.4402
2015	0.4124	0.7924	0.4908	0.4381
2017	0.4056	0.7545	0.4772	0.4462
2020	0.3829	0.7489	0.4854	0.4568

数据来源:2005—2020年中国投入产出表。*a*是农业部门,*m*是制造业部门,*ps*是生产性服务业部门,*cs*是消费性服务业部门。下同。

其次,产业间关联呈交互融合发展趋势。表2给出2010年和2020年各部门中间投入品的使用份额比较,其中制造业产品作为中间投入要素的份额最大,农业和服务业部门分别使用了大量的农业部门产品和服务业部门产品作为中间投入要

素。由于部门间相互融合,在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业部门使用的中间投入品里,制造业产品所占份额分别为46%和60%(以2010年为例)。类似地,Chor et al.(2021)、汪泽和李荣林(2024)根据2005—2014年中国进口上游度和出口上游度数据测算中国价值链嵌入长度的变化,发现中国国内价值链嵌入长度总体呈现扩张趋势。

表2 各部门中间投入使用不同部门产品的份额

使用份额	2010年				2020年			
	<i>a</i>	<i>m</i>	<i>ps</i>	<i>cs</i>	<i>a</i>	<i>m</i>	<i>ps</i>	<i>cs</i>
中间投入使用 <i>a</i> 产品份额	0.32	0.07	0.02	0.05	0.31	0.06	0.003	0.02
中间投入使用 <i>m</i> 产品份额	0.52	0.80	0.46	0.60	0.44	0.72	0.305	0.35
中间投入使用 <i>ps</i> 产品份额	0.16	0.13	0.52	0.35	0.25	0.22	0.692	0.63

数据来源:2010年和2020年中国投入产出表。

最后,讨论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影响。根据2007—2020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农业部门、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中间投入产品的份额呈现整体上升趋势,表明服务业部门对所有部门生产的重要性都在增强。其中,生产性服务业部门产品作为制造业部门中间投入产品使用的份额在2007年为12%、2010年为13.4%、2012年为14.5%、2015年为17.8%、2017年为19%、2020年为22%,可见生产性服务业在投入产出结构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大。

三、理论模型

本文构建包含四部门—多地区、非位似偏好、生产规模经济和上下游产业联系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定量分析一体化建设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具体地,(1)假设模型中存在*N*个地区,每个地区又包括农村(*r*)和城市(*u*)两个子区域:其中,农村生产农业部门(*a*)产品,是农村地区生产的产品组合;城镇生产制造业部门(*m*)产品、生产性服务业部门(*ps*)产品和消费性服务业部门(*cs*)产品。(2)除*cs*产品不可跨地区贸易(但同一地区内的子区域间可以自由流通),其他部门产品在地区间均可贸易,但跨地区贸易需付出贸易成本,本文将此记为冰山成本。^①(3)劳动力可以跨地区或子区域流动,但跨地区或子区域流动需支付成本,用效用损失^②刻画。(4)考虑生产的中间投入—产出关系,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赋能效应。(5)考虑非位似效用偏好,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劳动力对非农部门产品的消费需求增加更快。

(一)生产与贸易

各部门生产和贸易的设定同Eaton & Kortum(2002)的经典假设类似。每个部门*i* ∈ {*a*, *m*, *ps*, *cs*}都由许多不同种类的产品*v*构成,*v* ∈ [0, 1]。*j*地区最终使用的*i*

^① 冰山成本既同自然条件和运输技术相关,又受制度性区域分割的影响。在我国转型时期的行政体制下,往往在辖区边界存在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障碍,导致贸易成本提高。

^② 效用损失既反映地区间的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等,又反映户籍制度等因素造成的劳动力流动障碍。

部门产品是这些产品的 CES 函数加总:

$$Y_{i,j} = \left[\int_0^1 y_{i,j}(v)^{\frac{\varphi_i - 1}{\varphi_i}} dv \right]^{\frac{\varphi_i}{\varphi_i - 1}}, i \in \{a, m, ps, cs\} \quad (1)$$

其中, $y_{i,j}(v)$ 是 j 地区所使用的 i 部门的产品 v , 而 $\varphi_i > 1$ 是同一部门内不同种类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对于最终产品 $Y_{i,j}$, 除了 cs 仅作为最终消费品外, 其他部门 $\{a, m, ps\}$ 产品既可用作最终消费, 也可用作生产的中间投入品。生产需要使用劳动力、土地和中间投入品。 j 地区 i 部门的企业生产的 v 产品的函数为:

$$y_{i,j}(v) = L_j^{\zeta_i} \psi_{i,j}(v) L_{i,j}(v)^{\beta_i} T_{i,j}(v)^{\gamma_i} \left[\prod_{g \in \{a, m, ps\}} M_{i,jg}(v)^{\theta_{i,g}} \right]^{1 - \beta_i - \gamma_i}, i \in \{a, m, ps, cs\}$$

其中, j 地区 i 部门生产产品 v 的企业劳动力和土地需求分别为 $L_{i,j}(v)$ 和 $T_{i,j}(v)$, 使用 $g \in \{a, m, ps\}$ 部门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品的需求量为 $M_{i,jg}(v)$ 。 β_i 和 γ_i 分别为部门劳动力和土地要素收入份额。企业的实际生产率由 $L_j^{\zeta_i}$ 和 $\psi_{i,j}$ 共同组成, 其中 $L_j^{\zeta_i}$ 反映由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 j 地区劳动力数量越多, 企业生产率越高, 该效应的大小受弹性参数 ζ_i 影响。 $\psi_{i,j}$ 反映了 j 地区 i 部门每个企业生产技术差异, 服从独立同分布的 Fréchet 分布, 满足 $F_{i,j}(\psi) = e^{-A_{i,j}\psi^{-\sigma}}$ 。^① $\theta_{i,g}$ 反映部门 i 使用 g 部门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品的要素份额, 满足 $\sum_{g \in \{a, m, ps\}} \theta_{i,g} = 1$ 。

定义 $w_{i,j}$ 和 $r_{i,j}$ 分别为 j 地区 i 部门的工资率和土地租金, 允许各地区在城乡间有差异;^② $P_{i,j}$ 是 j 地区 i 部门的产品价格。给定生产技术和要素、产品价格, 抽取了 $\psi_{i,j}$ 的企业生产产品 v 的单位成本或出厂价格符合:

$$p_{i,j}(v) = \frac{w_{i,j}^{\beta_i} r_{i,j}^{\gamma_i} \left(\prod_{g \in \{a, m, ps\}} P_{g,j}^{\theta_{i,g}} \right)^{1 - \beta_i - \gamma_i}}{L_j^{\zeta_i} \psi_{i,j}(v)}, i \in \{a, m, ps, cs\} \quad (2)$$

跨地区贸易存在贸易成本, j 地区要从 d 地区获得 1 单位可贸易部门 $t \in \{a, m, ps\}$ 产品, d 地区必须生产 $\tau_{t,jd} \geq 1$ 单位 ($\tau_{t,jd}$ 为冰山成本)。因此, j 地区的消费者为消费 d 地区生产的产品最终支付的价格将是单位成本乘以贸易成本。根据 $\psi_{i,j}$ 服从 Fréchet 分布的性质, j 地区从 d 地区购买的可贸易部门 t 产品所占的市场份额满足:

$$\pi_{t,jd} = \frac{\left[\tau_{t,jd} w_{t,d}^{\beta_t} r_{t,d}^{\gamma_t} \left(\prod_{g \in \{a, m, ps\}} P_{g,d}^{\theta_{t,g}} \right)^{1 - \beta_t - \gamma_t} / (L_d^{\zeta_t} A_{t,d} \frac{1}{\sigma}) \right]^{-\sigma}}{\sum_{d'=1}^N \left[\tau_{t,jd'} w_{t,d'}^{\beta_t} r_{t,d'}^{\gamma_t} \left(\prod_{g \in \{a, m, ps\}} P_{g,d'}^{\theta_{t,g}} \right)^{1 - \beta_t - \gamma_t} / (L_{d'}^{\zeta_t} A_{t,d'} \frac{1}{\sigma}) \right]^{-\sigma}} \quad (3)$$

j 地区 t 可贸易部门的产品最终价格满足:

① $A_{i,j}$ 是决定 ψ 的平均技术水平参数, σ 为弹性参数, 会影响 ψ 的方差水平, 具体细节参见 Eaton & Kortum (2002)、Tombe & Zhu (2019)、Hao et al. (2020)、Henderson et al. (2022)。

② 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给出一般化情形, 即考虑部门差异的量化分析, 允许所有部门间的工资率存在差异。

$$P_{t,j} = \left\{ \sum_{d=1}^N \left[\frac{\tau_{t,jd} w_{t,d}^{\beta_t} r_{t,d}^{\gamma_t} \left(\prod_{g \in \{a, m, ps\}} P_{g,d}^{\theta_{t,g}} \right)^{1-\beta_t-\gamma_t}}{L_d^{\zeta_t} A_{t,d}^{\frac{1}{\sigma}}} \right]^{-\sigma} \right\}^{-\frac{1}{\sigma}} \quad (4)$$

由于消费性服务业在地区间不可贸易,故消费性服务业产品的价格满足:

$$P_{cs,j} = \frac{w_{cs,j}^{\beta_{cs}} r_{cs,j}^{\gamma_{cs}} \left(\prod_{g \in \{a, m, ps\}} P_{g,j}^{\theta_{cs,g}} \right)^{1-\beta_{cs}-\gamma_{cs}}}{L_j^{\zeta_{cs}} A_{cs,j}^{\frac{1}{\sigma}}} \quad (5)$$

(二)效用偏好

在模型中,存在总测度为1、技能水平相同的许多劳动力。假设产品消费、住房消费和选址偏好共同决定个体效用水平,类似Tombe(2015)的做法,设定所有个体具有相同的非位似消费偏好,满足Stone-Geary效用函数:

$$U_{jd}^{kn} = \epsilon_j^k (C_{jd}^{kn, a} - \bar{a})^{\alpha_a} (C_{jd}^{kn, m})^{\alpha_m} (C_{jd}^{kn, ps})^{\alpha_{ps}} (C_{jd}^{kn, cs})^{\alpha_{cs}} (h_{jd}^{kn})^{\alpha_h} \quad (6)$$

其中, $\bar{a} > 0$ 是维持生计的产品消费量, $C_{jd}^{kn, i}$ 是来自 d 地区 n 子区域并迁移到 j 地区 k 子区域个体对 i 产品的消费量, h_{jd}^{kn} 是对住房的消费量。消费偏好参数 α_i 反映代表性个体对不同产品的偏好, α_i 越大则对 i 产品偏好越大(满足 $\sum_{i \in \{a, m, ps, cs\}} \alpha_i + \alpha_h = 1$)。式(6)反映所有个体具有相同的非位似消费偏好,随着收入的增加,不同产品消费的配置结构会变化,对 a 的收入需求弹性更小。劳动力自由选择居住地以最大化自身福利,其选址偏好 ϵ_j^k 满足独立同分布,服从Fréchet分布: $F(\epsilon) = e^{-\epsilon^\kappa}$, κ 为劳动供给弹性。

定义 I_{jd}^{kn} 为从 (d, n) 流向 (j, k) 个体的收入, $s_j^k = \frac{P_{a,j} C_j^{k,a}}{I_j^k}$ 是对 a 的实际消费份额,则

$P_{a,j} \bar{a} = \frac{s_j^k - \alpha_a}{1 - \alpha_a} I_j^k$ 。根据效用函数,从 (d, n) 流向 (j, k) 个体对 i 产品的消费支出 $D_{jd}^{kn, i}$ 为:

$$D_{jd}^{kn, a} = s_j^k I_{jd}^{kn}, D_{jd}^{kn, i'} = \alpha_{i'} \frac{1 - s_j^k}{1 - \alpha_a} I_{jd}^{kn}, i' \in \{m, ps, cs\} \quad (7)$$

类似地,住房消费支出 $D_{jd}^{kn, h} = \alpha_h \frac{1 - s_j^k}{1 - \alpha_a} I_{jd}^{kn}$ 。定义 $V_{jd}^{kn} = \frac{I_{jd}^{kn}}{1 - \alpha_a P_{a,j}^{\alpha_a} P_{m,j}^{\alpha_m} P_{ps,j}^{\alpha_{ps}} P_{cs,j}^{\alpha_{cs}} r_{jk}^{\alpha_h}}$

为间接效用函数; j 地区 k 子区域个体的平均收入为 $I_j^k = \sum_n \sum_{d=1}^N I_{jd}^{kn} L_{jd}^{kn} / L_j^k$,则 j 地区

k 子区域个体有 $V_j^k = \frac{1 - s_j^k}{1 - \alpha_a P_{a,j}^{\alpha_a} P_{m,j}^{\alpha_m} P_{ps,j}^{\alpha_{ps}} P_{cs,j}^{\alpha_{cs}} r_{jk}^{\alpha_h}} I_j^k$ 。定义 m_{jd}^{kn} 为从 (d, n) 迁移到

(j, k) 的流动人口份额,满足 $\sum_k \sum_{j=1}^N m_{jd}^{kn} = 1$ 。个体跨地迁移会面临迁移成本 μ_{jd}^{kn} ,

其迁移的福利水平为: $\epsilon_j^k V_{jd}^{kn} / \mu_{jd}^{kn}$ 。由于 ϵ_j^k 服从Fréchet分布,均衡的流动人口份额满足:

$$m_{jd}^{kn} = \frac{(V_{jd}^{kn}/\mu_{jd}^{kn})^\kappa}{\sum_{k' \in \{r, u\}} \sum_{j'=1}^N (V_{j'd}^{k'n}/\mu_{j'd}^{k'n})^\kappa} \quad (8)$$

(三)空间一般均衡

1. 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

$$\begin{aligned} L_j^u &= L_{m,j} + L_{ps,j} + L_{cs,j} \\ L_j^r &= L_{a,j} \\ L_j &= L_j^r + L_j^u \\ L_j^k &= \sum_{n \in \{r, u\}} \sum_{d=1}^N m_{jd}^{kn} \bar{L}_d^n, \quad k \in \{r, u\} \end{aligned} \quad (9)$$

\bar{L}_d^n 是指 d 地区 n 子区域的户籍人口; $\sum_{j=1}^N L_j = 1$ 。

2. 区域贸易平衡条件

由于 j 地区 k 子区域个体对部门产品的消费支出为 $D_j^{k,a} = s_j^k I_j^k$ 和 $D_j^{k,i^*} = \alpha_{i^*} \frac{1 - s_j^k}{1 - \alpha_a} I_j^k$, $i^* \in \{m, ps, cs, h\}$, 定义 i 部门 j 地区的销售收入为 $R_{i,j}$, 则可贸易部门 $t \in \{a, m, ps\}$ 的产品市场均衡条件满足:

$$R_{i,t} = \sum_j \pi_{t,jd} \left[D_j^{u,t} L_j^u + D_j^{r,t} L_j^r + \sum_{i \in \{a, m, ps, cs\}} (1 - \beta_i - \gamma_i) \theta_{i,t} R_{i,j} \right] \quad (10)$$

其中, 由于 cs 产品不可跨地区贸易, 满足本地生产=消费, 均衡条件表示为:

$$R_{cs,j} = D_j^{u,cs} L_j^u + D_j^{r,cs} L_j^r \quad (11)$$

3. 收支平衡

土地是不可贸易品, 参考 Tombe & Zhu (2019)、Hao et al. (2020) 和钟粤俊等 (2023) 的做法, 假设土地收入被本地户籍人口所有, 流动人口不获得土地收入。^① 给定 j 地区 k 子区域土地数量 \bar{T}_j^k 的条件下, 土地市场的出清条件满足:

$$\begin{aligned} \bar{T}_j &= \bar{T}_j^r + \bar{T}_j^u \\ r_{r,j} \bar{T}_j^r &= r_{r,j} T_{a,j} + \alpha_h (I_j^r - P_{a,j} \bar{a}) L_j^r \\ r_{u,j} \bar{T}_j^u &= r_{u,j} (T_{m,j} + T_{ps,j} + T_{cs,j}) + \alpha_h (I_j^u - P_{a,j} \bar{a}) L_j^u \\ r_{i,j} \bar{T}_{i,j} &= \gamma_i \left(\frac{w_{i,j} L_{i,j}}{\beta_i} \right), \quad i \in \{a, m, ps, cs\} \end{aligned} \quad (12)$$

地区城乡的平均收入分别为: $I_j^r = w_{r,j} \frac{1 + \gamma_a \beta_a}{1 - \alpha_h (1 - s_j^r) / (1 - \alpha_a)}$ 和 $I_j^u = w_{u,j} \left[1 + \left(\frac{\gamma_m L_{m,j}}{\beta_m L_j^u} + \frac{\gamma_{ps} L_{ps,j}}{\beta_{ps} L_j^u} + \frac{\gamma_{cs} L_{cs,j}}{\beta_{cs} L_j^u} \right) / [1 - \alpha_h (1 - s_j^u) / (1 - \alpha_a)] \right]$ 。由于只有留在本地的户籍人口可以平均共享土地收入, 故流动人口的平均收入为: $I_{jd}^{kn} = w_{k,j}$, 城乡未迁移人口的平均收入为:

^① 参考 Lu et al. (2025) 的做法, 考虑部分土地租金收益被流动人口获得的情况, 假设部门生产的土地租金收入按常住人口配置, 住房租金收入只配置给本地户籍人口, 结论并不改变, 具体讨论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I_{jj}^{rr} = w_{r,j} \left[1 + \left(\frac{\gamma_a}{\beta_a} + \alpha_h \frac{1 - s_j^r}{1 - \alpha_a} \right) / \left(1 - \alpha_h \frac{1 - s_j^r}{1 - \alpha_a} \right) \frac{L_{a,j}}{L_{jj}^{rr}} \right]$ 和 $I_{jj}^{uu} = w_{u,j} \left\{ 1 + \left[\left(\frac{\gamma_m}{\beta_m} + \alpha_h \frac{1 - s_j^u}{1 - \alpha_a} \right) \frac{L_{m,j}}{L_{jj}^{uu}} + \left(\frac{\gamma_{ps}}{\beta_{ps}} + \alpha_h \frac{1 - s_j^u}{1 - \alpha_a} \right) \frac{L_{ps,j}}{L_{jj}^{uu}} + \left(\frac{\gamma_{cs}}{\beta_{cs}} + \alpha_h \frac{1 - s_j^u}{1 - \alpha_a} \right) \frac{L_{cs,j}}{L_{jj}^{uu}} \right] / \left(1 - \alpha_h \frac{1 - s_j^u}{1 - \alpha_a} \right) \right\}$ 。本文定义土地溢价收益率 (Land Rebate Rate) δ_{jd}^{kn} 为:

$$\delta_{jd}^{kn} = \begin{cases} 1, & j \neq d \text{ or } k \neq n \\ 1 + \frac{L_{a,j} \gamma_a / \beta_a + \alpha_h (1 - s_j^r) / (1 - \alpha_a)}{L_{jj}^{rr} 1 - \alpha_h (1 - s_j^r) / (1 - \alpha_a)}, & j = d, k = n = r \\ 1 + \frac{L_j^u \left[\sum_{i' \in \{m, ps, cs\}} \frac{\gamma_{i'} / \beta_{i'} + \alpha_h (1 - s_j^u) / (1 - \alpha_a)}{1 - \alpha_h (1 - s_j^u) / (1 - \alpha_a)} \frac{L_{i',j}}{L_j^u} \right]}{L_{jj}^{uu}}, & j = d, k = n = u \end{cases}$$

从 (d, n) 流向 (j, k) 的个体平均收入可一般化表示为 $I_{jd}^{kn} = \delta_{jd}^{kn} w_{k,j}$ 。

(四) 比较静态分析

给定地区外生参数集合 $\{s_j^k, \bar{T}_j, \tau_{i,jd}, \mu_{jd}^{kn}, A_{i,j}\}$ 以及其他地区同质性外生参数集合 $\{\alpha_i, \alpha_h, \kappa, \sigma, \beta_i, \gamma_i, \theta_{i,t}, \zeta_i, \varphi_i\}$ 后, 求解满足均衡条件的内生变量集合 $\{w_{i,j}, r_{i,j}, L_{i,j}, R_{i,j}, P_{i,j}, I_{jd}^{kn}, m_{jd}^{kn}, V_{jd}^{kn}, \pi_{i,jd}\}$, 得到本文的全局一般均衡。

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下, 空间扭曲程度和资源配置会发生改变, 直接表现为贸易摩擦和人口流动摩擦降低 (Tombe & Zhu, 2019; 钟粤俊等, 2023; 林晨和李宇潇, 2024), 带来 μ_{jd}^{kn} 和 $\tau_{i,jd}$ 的变化。这会直接影响商品贸易和劳动力流动, 从而影响规模经济、收入、生产率、生产决策和产品价格, 进而导致产业结构转型、增长和社会福利变化。进一步地, 当考虑部门赋能效应时,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会产生两方面影响: (1) 部门赋能效应变化体现为中间投入—产出结构 $\theta_{i,t}$ 变化,^① 这会影响到地区贸易和分工, 因为核心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等的生产率更高,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后, 生产性服务业赋能效应的存在会更有利于在全国范围扩大生产和资源配置, 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2) 部门赋能效应会影响部门实际生产率变化, 从而影响到结构转型、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有利于制造业部门生产率提升, 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生产率提高会驱动结构调整和激发增长。^②

定义 X' 为 X 变量变化后的值, $\hat{X} = X'/X$ 为 X 变量的变化。基于变化代数运算 (Exact Hat Algebra) 法, 可以在一体化改革前后的不同参数环境下对基准模型或反事实模型进行数值求解。本文提出如下命题:^③

命题 1: 均衡时, 实际收入变化和迁移成本变化共同决定人口流动决策的变化。因此, 一体化建设影响下的流动人口份额变化可以表示为:

① Lu et al. (2025) 指出, 中间投入—产出份额的变化是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偏好和竞争决策的关键机制。
 ② 既有研究从部门生产率进步所引致的产业结构调整 and 贸易自由化冲击等视角, 讨论了产业关联或赋能效应 (Burstein & Vogel, 2010; 张群等, 2025)。
 ③ 因篇幅限制, 具体证明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widehat{m}_{jd}^{kn} = \frac{(\widehat{V}_{jd}^{kn} / \widehat{\mu}_{jd}^{kn})^\kappa}{\sum_{k'} \sum_{j'} m_{j'd}^{k'n} (\widehat{V}_{j'd}^{k'n} / \widehat{\mu}_{j'd}^{k'n})^\kappa} \quad (13)$$

命题2:实际收入变化和人口流动变化等共同决定了社会福利水平变化,故一体化建设引起的变化导致社会总福利变化满足:

$$\widehat{W} = \sum_n \sum_d \varpi_{dn} \widehat{V}_{dd}^{nn} (\widehat{m}_{dd}^{nn})^{-\frac{1}{\kappa}} \quad (14)$$

其中, $\varpi_{dn} = \frac{\lambda_{dn} V_{dd}^{nn} (m_{dd}^{nn})^{-\frac{1}{\kappa}}}{W}$ 是初始权重,我们可以类似讨论地区生产总值变化。

四、量化分析

本文使用变化代数运算法进行量化分析,分别以数据较完整的2010年省级数据、2017年省级数据和2017年地市级数据作为基准时期进行参数校准,并分别刻画对应的初始均衡。

(一)参数校准

本部分仅展示2010年省级层面数据作为基准时期的核心参数及其校准过程(其他年份或地市级可作类似讨论),具体的参数、数值和定义见表3。

表3 模型参数及取值

参数	数值	定义
$(\alpha_a, \alpha_m, \alpha_{ps}, \alpha_{cs}, \alpha_h)$	(0.1, 0.2, 0.35, 0.15, 0.2)	部门产品消费偏好份额
s_j^k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地区对a产品实际消费份额
κ	1.5(Tombe & Zhu, 2019)	区域劳动供给弹性
σ	4(Tombe, 2015)	贸易弹性
$(\beta_a, \beta_m, \beta_{ps}, \beta_{cs})$	(0.43, 0.19, 0.45, 0.48)	部门劳动要素份额
$(\gamma_a, \gamma_m, \gamma_{ps}, \gamma_{cs})$	(0.16, 0.04, 0.09, 0.09)	部门土地要素份额
$(\theta_{a,a}, \theta_{a,m}, \theta_{a,ps})$	(0.32, 0.52, 0.16)	a生产中间投入品份额
$(\theta_{m,a}, \theta_{m,m}, \theta_{m,ps})$	(0.07, 0.80, 0.13)	m生产中间投入品份额
$(\theta_{ps,a}, \theta_{ps,m}, \theta_{ps,ps})$	(0.02, 0.46, 0.52)	ps生产中间投入品份额
$(\theta_{cs,a}, \theta_{cs,m}, \theta_{cs,ps})$	(0.05, 0.60, 0.35)	cs生产中间投入品份额
$(\zeta_a, \zeta_m, \zeta_{ps}, \zeta_{cs})$	(0, 0.05, 0.1, 0.1)	部门生产规模效应弹性
\overline{T}_j (或 $\overline{T}_j^r, \overline{T}_j^u$)	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计算	地区土地供应存量占全国份额
m_{jd}^{kn}	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人口迁移份额数据
$\pi_{t,jd}$	根据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计算	t部门贸易份额数据
\overline{L}_d^n	根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户籍人口数据

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数据来源为李善同等(2023);由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只有2010年和2015年的,所以本文分别用它们代理计算2010年和2017年的人口流动。

1. 效用与生产函数

Tombe & Zhu (2019) 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发现, 区域劳动供给弹性 κ 取值为 1.5, 跨区域贸易弹性 σ 取值为 4。^①关于部门规模效应弹性 ζ_i 的取值, 参考钟粤俊等 (2023) 的做法, 设定农业部门的 $\zeta_a = 0$, 制造业部门的 $\zeta_m = 0.05$, 服务业部门的 $\zeta_{ps} = \zeta_{cs} = 0.1$ 。^②为检验规模经济对结论的影响, 本文会在敏感性分析中同时对比其他不同规模效应参数组合下的反事实分析结果, 检验结论的稳健性。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部门消费份额数据计算 s_j^k 和住房消费份额 α_h ; 根据 2002—2017 年全国投入产出表最终消费计算部门产品消费结构, 得到部门消费份额 $\alpha_i, i \in \{a, m, ps, cs\}$ 。部门 i 生产的中间投入份额 $(1 - \beta_i - \gamma_i)$ 通过 2010 年全国投入产出表中的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计算; 劳动要素收入份额 β_i 根据 2010 年全国投入产出表和 Lu et al. (2025) 计算; 最后, 计算土地要素收入份额 γ_i 。在敏感性分析部分, 替换其他 β_i 和 γ_i 数值进行校准和量化分析, 结论保持稳健。

2. 劳动力流动成本和贸易成本

可以使用商品和要素在区域或全国流动的障碍因素和摩擦成本衡量国内市场的统一性程度和水平。本文的量化分析 (包括初始均衡和反事实分析) 依赖地区间劳动力流动成本和贸易成本等参数, 故需要先对这些参数进行计算。

劳动力流动成本 μ_{jd}^{kn} 的计算。一体化建设的关键之一就是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及其演变, 劳动力流动及其演变规律揭示了制度障碍的变化规律。根据式 (8), 可以得到劳动力流动成本满足:

$$\mu_{jd}^{kn} = \frac{V_{jd}^{kn}}{V_{dd}^{nn}} \left(\frac{m_{jd}^{kn}}{m_{dd}^{nn}} \right)^{-1/\kappa} \quad (15)$$

因此, 利用实际数据中的劳动力流动 m_{jd}^{kn} 、地区对 a 的实际消费份额 s_j^k 、地区实际工资率 w_j^k/P_{jk} 、土地溢价收益率 δ_{jd}^{kn} 和区域劳动力供给弹性参数 κ 等, 就可以计算出和现实数据对应的劳动力流动成本 μ_{jd}^{kn} 。

根据 201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2010 年的劳动力流动成本均值为 2.78, 省内的劳动力流动成本均值为 2.19, 省间的劳动力流动成本均值为 30.21。动态地看, Hao et al. (2020) 根据 2000—2015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迁移成本发现, 2000—2010 年中国的总迁移成本下降了 27%, 2010—2015 年的总迁移成本下降了 26.7%, 迁移成本下降幅度介于 25%—30%; 类似地, 钟粤俊等 (2023) 讨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减碳”的影响时, 也将迁移成本下降 25% 作为反事实分析的基准。与相关文献保持一致, 本文对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的反事实分析给出迁移成本下降 25% 的结果, 替换其他下降幅度并不改变本文结论。

贸易成本 $\overline{\tau_{l,jd}}$ 的计算。一体化建设的另一个关键是产品市场流通及其演变, 产

① 在一定范围内调整这个参数取值 (κ 取值在 1—4 之间), 并不影响本文结论。Hao et al. (2020) 使用 2000—2015 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量化分析时, 假设的 κ 取值也为 1.5。

② 根据 2008 年经济普查数据, 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部门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差异不大。

品贸易流通及其演变规律揭示的是贸易成本的演变规律和特征。本文主要采用了 Head & Ries(2001)的方法来估算贸易成本,即:

$$\overline{\tau}_{i,jd} = \sqrt{\tau_{i,jd} \tau_{i,dj}} = \left(\frac{\pi_{i,j} \pi_{i,dd}}{\pi_{i,jd} \pi_{i,dj}} \right)^{1/2\sigma} \quad (16)$$

利用各地区一部门间的贸易数据(或份额 $\pi_{i,jd}$)和贸易弹性参数 σ ,可以计算各地之间的贸易成本。地区一部门贸易数据根据《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1987-2017年》的2012年和2017年数据计算,以刻画2010年和2017年的贸易关系。^①以2012年的数据为例, a 、 m 、 ps 部门贸易成本的均值分别为3.99、2.54和2.89。

需要说明的是,贸易成本包括制度性贸易成本和距离等引起的客观贸易成本。由于客观贸易成本是地理距离或技术因素等非主观因素导致的,故本文产品市场一体化建设的反事实分析所调整的贸易成本是指降低制度障碍带来的地区间贸易成本变化。当前我国地区间贸易成本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阻力(陈朴等,2021),而降低产品流通中的制度性成本及障碍与统一大市场建设提出的降低制度性成本对应。研究发现,中国的制度性贸易成本占总贸易成本份额的均值约为20%。韩佳容(2021)指出,2002—2012年,中国国内贸易中的制度性贸易成本在国内总贸易成本中占比平均为21.7%,十年间制度性贸易成本在总贸易成本中占比从11.9%上升到24.6%;陈韬和闫中晓(2024)指出,中国的制度性贸易摩擦比加拿大高20%以上;Zheng et al.(2022)基于车流大数据发现,控制所有其他变量后,省界所表示的制度成本相对于距离、方言、自然分割等成本对贸易影响的份额为15%—25%;才国伟等(2022)和钟粤俊等(2023)探讨贸易成本下降的影响,其反事实分析中贸易成本的下降幅度为20%。为了与相关文献保持一致,本文对产品市场一体化建设的反事实分析给出降低贸易成本20%的假设。

(二)区域一体化的反事实分析

表4给出不同类型区域一体化的反事实分析结果。Panel A讨论区域劳动力要素一体化建设的影响:降低区域内地区间迁移成本(区域内的迁移成本下降25%,但地区子区域内的迁移成本保持不变,比如上海市城镇常住人口如果是上海市城镇户籍,其迁移成本不调整)后,城市化率提高1.99个百分点,实际GDP增长1.1%,社会福利提升8.3%,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实际GDP增长约1%,消费性服务业就业占比、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占比和制造业就业占比分别增加0.22个、0.99个和0.78个百分点,表明区域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和产出均有提升。服务业内部的异质性对比显示,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效应高于消费性服务业。

当前我国地区间贸易成本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阻力之一(陈朴等,2021),区域一体化建设的另一个表现是降低产品流通成本,尤其是减少行政分割带来的产品流通障碍,Panel B给出降低区域内部门产品贸易成本(贸易成本下降20%)的影响。

^① 类似做法的研究还包括 Hao et al.(2020)、韩佳容(2021)、钟粤俊等(2023)、陈韬和闫中晓(2024)、Lu et al.(2025)。

结果表明,降低区域内的产品贸易成本,实际GDP和社会福利将分别增长1.9%和1.8%。

Panel C考察同时降低迁移成本和贸易成本的区域一体化改革结果,通过对比可知:多维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社会福利提升、城市化率水平和就业结构等产生的影响出现“1+1约等于2”的效应,同时改革的影响等于分别改革之和。^①

表4 区域一体化的影响 单位:%,个百分点

城市化率增长	GDP增长	社会福利增长	消费服务业就业占比	生产服务业就业占比	制造业就业占比	生产服务业GDP增长	制造业GDP增长
Panel A: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							
1.99	1.1	8.3	0.22	0.99	0.78	1.1	0.9
Panel B:降低部门产品贸易成本							
0.11	1.9	1.8	0.01	-0.17	0.27	3.9	0.7
Panel C:同时改革劳动力成本和贸易成本							
2.09	3.0	10.2	0.22	0.81	1.05	5.0	1.6

注:城市化率是指各地区的人口城市化率;GDP增长是指实际GDP增长。GDP增长、社会福利增长、生产性服务业GDP增长和制造业GDP增长的单位为%,其他指标的单位为“个百分点”。下同。

(三)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反事实分析

首先分析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的影响。表5的Panel A讨论了降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迁移成本所产生的影响:令跨地区或跨子区域流动的迁移成本下降为2010年迁移成本的75%,包括省内和跨省的流动,但地区子区域内的迁移成本保持不变。结果表明,当迁移成本下降时,城市化率增长2.84个百分点,实际GDP增长2.5%,社会福利提高10.6%,消费性服务业就业占比、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占比和制造业就业占比分别增加0.33个、1.42个和1.09个百分点,产业结构转型效应较大。^②

接下来分析产品市场一体化改革的影响,假设降低全国的部门产品贸易成本(贸易成本下降20%)。Panel B给出贸易成本变化的反事实分析,当2010年可贸易部门的产品贸易成本下降,实际GDP和社会福利均增长18%以上,生产性服务业GDP增长率远大于制造业GDP的增长。

Panel C给出同时降低迁移成本和贸易成本的全国一体化改革的结果,同时改

^① 表4给出的改革是成本下降后的一次性影响。当其他条件不变,改革成本下降,考虑市民化后的长期影响会持续下去。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过程会从两个方面产生影响:一方面,流动人口面临的迁移成本降低;另一方面,部分流动人口逐渐本地化,享受本地人的待遇(土地溢价率会变化),即本地化的流动人口的迁移成本下降为1,上述两方面都会使社会总福利水平上升。因此,本文量化分析估算的福利改进效应是下限(Lower Bound)估计,在考虑流动人口本地化或市民化后,实际增长和福利效应会更大。

^②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降低劳动力流动障碍的改革是指城乡所有的流动成本都下降(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应),全国一体化改革的结果和Tombe & Zhu(2019)接近,但是与钟粤俊等(2023)有差异,因为后者的劳动力市场反事实分析只考虑了城镇流向城镇的改革,忽视了农村流向城镇的改革。

革对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就业结构等产生的影响出现“1+1大于2”的效应(同时改革效应大于分别改革效应之和)。其原因是,全国范围的同时改革产生了政策互补和外溢效应,故改革所释放的结构红利进一步放大。

对比表4(区域一体化)和表5(全国统一大市场)改革的影响发现:(1)劳动力流动成本下降后,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效应均大于区域一体化的影响,但一体化建设对福利和结构转型的收益主要由区域一体化驱动,其福利和结构转型效应约为全国一体化建设的2/3。(2)降低部门产品贸易成本或让要素和产品市场同时改革,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效应的影响均大于区域一体化的影响。因为产品改革或“产品+要素”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再配置所释放的结构和增长红利会更大。

城市化率增长	GDP增长	社会福利增长	消费服务就业占比	生产服务就业占比	制造业就业占比	生产服务GDP增长	制造业GDP增长
Panel A: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							
2.84	2.5	10.6	0.33	1.42	1.09	2.6	2.7
Panel B:降低部门产品贸易成本							
0.48	19.9	18.9	0.08	-1.08	1.48	30.8	12.7
Panel C:同时改革劳动力成本和贸易成本							
3.36	23.1	31.6	0.42	0.30	2.64	34.2	15.9

进一步地,本文开展了一系列敏感性分析。首先,讨论规模经济变化的影响,不同规模经济效应下,区域一体化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结果相似,但是规模经济效应越大,增长和福利改进效应越强。其次,改变土地要素份额后进行量化分析,结论依然稳健。再次,剥离非位似偏好效应的影响。^①最后,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给出了区域间一体化改革的反事实分析结果。

(四)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效应

不同发展阶段的赋能效应是理解中国渐进一体化改革的关键,随着发展阶段提升和分工深化,生产性服务业在投入产出网络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对其他部门的影响也逐步增加,即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效应在增大。早期赋能效应较弱时,一体化改革的收益主要由区域一体化驱动;随着赋能效应的增加,全国统一大市场改革对增长和转型的推动作用在不断变大。本部分主要从两个维度刻画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效应:生产的中间投入产出结构变化和部门关联效应。量化分析结果表明,生产的中间投入产出结构变化主要影响产业结构调整,部门关联效应主要影响增长和社会福利。

一方面,前文的特征事实指出,2000—2020年,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部门中间

^① 因篇幅限制,上述量化分析结果并未展示。

投入产品的份额呈现上升趋势,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中间投入的赋能效应在增大,其中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中间投入对生产性服务业产品使用份额的增长更快。具体地,本部分对基准分析的中间投入份额进行调整,用2020年全国投入产出表计算的中间投入份额替换2010年的中间投入份额(具体数值见表2)。表6汇报了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在中间投入所占份额增大后的区域一体化和全国一体化模拟结果:(1)生产的中间投入结构变化主要带来产业结构的调整,但对增长和福利水平的影响同基准结果相似(同表4、表5接近,不作展示)。由于农业部门作为中间投入的份额比较稳定,故本部分主要表现为制造业向生产性服务业转移的过程;(2)生产中间投入结构变化后,与基准分析相同的一体化改革力度带来的产业结构转型效应提高17%以上。且全国一体化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结构转型的促进效应比区域一体化建设高0.1个百分点以上(例如,0.35-0.24=0.11)。

表6 考虑生产中间投入结构的影响 单位:个百分点

类型	消费服务就业占比	生产服务就业占比	制造业就业占比
区域一体化降低 劳动力流动成本	0.22	1.20 (比基准多0.21个百分点)	0.57 (比基准低0.21个百分点)
区域一体化同时改革	0.22	1.05 (比基准多0.24个百分点)	0.81 (比基准低0.24个百分点)
全国一体化降低 劳动力流动成本	0.32	1.73 (比基准多0.31个百分点)	0.80 (比基准低0.29个百分点)
全国一体化同时改革	0.41	0.65 (比基准多0.35个百分点)	2.26 (比基准低0.38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制造业部门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故制造业部门发展会受所在地服务业部门发展的影响,本部分将此定义为部门关联效应。^①本文用 $Y_{ps,j}^{\Lambda}$ 刻画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部门发展影响的部门关联效应,其中 Λ 表示生产性服务业部门对制造业部门影响的弹性(基准时期将 Λ 取值标准化为0)。因此, j 地区 m 部门的企业生产产品 v 的生产函数为:

$$y_{m,j}(v) = Y_{ps,j}^{\Lambda} L_j^{\xi_m} \psi_{m,j}(v) L_{m,j}(v)^{\beta_m} T_{m,j}(v)^{\gamma_m} \left[\prod_{g \in \{a, m, ps\}} M_{m,jg}(v)^{\theta_{m,g}} \right]^{1 - \beta_m - \gamma_m}$$

其他设定与基准模型做类似分析。由于基准时期将 Λ 标准化为0,所以本部分考虑的部门关联效应是相对基准时期的变动。新阶段(2008—2016年)比初期阶段(2000—2007年)的弹性参数大0.17,故本部分的部门关联效应参数 Λ 取值为0.17。^②表7给出部门关联效应 $\Lambda = 0.17$ 的一体化改革量化分析结果(Λ 替换其他取

① 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讨论了地区服务业规模对制造业部门发展影响的相关关系分析。

② 因篇幅限制,相关测算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值,类似分析)。实验1为部门关联效应后,降低区域内劳动力流动成本的结果;实验2为部门关联效应后,同时降低区域内劳动力流动成本和贸易成本的结果;实验3为部门关联效应后,降低全国层面劳动力流动成本的结果;实验4为部门关联效应后,同时降低全国层面劳动力流动成本和贸易成本的结果。

结果表明,考虑部门关联效应的区域一体化和全国一体化改革会带来GDP增长和福利水平提升(产业结构转型变化同表4、表5类似)。更重要的是,随着部门关联效应的加强,一体化改革所产生的增长和福利改进效应均有所提升,比基准模型多提升0.5个到3.1个百分点,增幅超过10%;且全国一体化产生的增长和福利改进效应提升更快,考虑部门关联效应让全国一体化较区域一体化对增长和福利改进效应多促进2.5个百分点($3.1-0.6=2.5$)。

表7 考虑部门关联的影响($\Lambda=0.17$, 基准 $\Lambda=0$) 单位:%

实验	类型	GDP 增长	社会福利增长
实验 1	区域一体化降低 劳动力流动成本	1.6 (比基准多增加 0.5 个百分点)	8.8 (比基准多增加 0.5 个百分点)
实验 2	区域一体化同时改革	3.6 (比基准多增加 0.6 个百分点)	10.8 (比基准多增加 0.6 个百分点)
实验 3	全国一体化降低 劳动力流动成本	3.4 (比基准多增加 0.9 个百分点)	11.5 (比基准多增加 0.9 个百分点)
实验 4	全国一体化同时改革	26.2 (比基准多增加 3.1 个百分点)	34.9 (比基准多增加 3.3 个百分点)

注:调整 Λ 的取值范围,本文的结论一致。

综上,对比基准结果(表4、表5)和考虑生产性服务业赋能效应的结果(表6、表7)发现,随着部门赋能效应的出现和加强,同基准分析相同的一体化改革所产生的结构转型、增长和福利提升效应均在变大,且全国一体化的提升效应比区域一体化更大。因为经济发展早期,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作用较弱,发挥跨区域分工和比较优势的重要性不高,故区域一体化就能满足发展的需要。然而,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由于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越来越多,协作范围进一步扩大,故全国一体化的作用也越强。

五、进一步扩展分析

(一)市场一体化建设与分工

本部分讨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对各地区尤其是核心地区(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重庆)的影响,分析区域分工和劳动力要素集聚效应。探讨基准模型下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对核心地区服务业和制造业就业占全国比重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改革要素和产品市场的结果可作类似分析)。

表8给出了劳动力市场全国一体化建设对核心地区的影响。^①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全国一体化使核心地区的GDP增长3.7%,增幅较全国增长的均值大1.2个百分点(同表5 Panel A的2.5%相比);服务业和制造业就业占全国就业比重分别增长0.80个和0.49个百分点,增长幅度占全国服务业和制造业就业占比增长的1/2左右。

表8 劳动力市场全国一体化对核心地区的影响
单位:%,个百分点

GDP 增长	服务业 就业占比增加	生产性服务 就业占比增加	消费性服务 就业占比增加	制造业 就业占比增加
3.7	0.80	0.64	0.16	0.49

(二)不同收入水平上的市场一体化建设

类似Tombe & Zhu(2019)和Hao et al(2020)的做法,本文调整地区一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使所有地区的收入提高10%,并以此作为初始基期,从而可以讨论不同收入水平上的一体化影响。表9的实验5和实验6是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并以收入水平提高10%作为初始状态,给出和基准模型表4的Panel A、Panel C一样改革的反事实分析结果;实验7和实验8是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并以收入水平提高10%作为初始状态,给出和表5的Panel A、Panel C一样改革的反事实分析结果。结果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与基准分析相同的市场一体化建设所产生的增长效应会变大,因为发展水平提高后,要素再配置效应会带来更大的增长红利,从而市场一体化产生的影响更大。

表9同时表明,全国一体化产生的增长效应比区域一体化大(实验5-6对比实验7-8)。因为全国一体化令国内的要素、产品再配置成本变低,更有利于释放增长红利;区域一体化只降低区域内要素、产品再配置的成本,故其产生的增长效应较全国一体化更小。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全国一体化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愈发明显。

表9 收入水平阶段提高的一体化建设效应 单位:%,个百分点

实验	类型	城市化率增长	GDP增长	社会福利增长
实验5	区域一体化降低 劳动力流动成本	1.99	1.2	8.7
实验6	区域一体化同时改革	2.09	3.2	10.7
实验7	全国一体化降低 劳动力流动成本	2.84	2.7	11.2
实验8	全国一体化同时改革	3.36	24.3	33.2

注:在不同发展阶段,一体化建设对就业部门的结构转型影响相同,本表格未汇报该结果。

^① 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中汇报了分省的分析结果,揭示各地区部门就业结构和城乡实际GDP的变化。

(三)2017年为基准的反事实分析

本部分展示以2017年省级层面数据作为基准时期的反事实分析结果(量化模型和校准细节同基准模型类似)。与基准分析相同的一体化改革力度下,结论和基准分析以2010年数据所得到的结论类似。^①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同时给出以2017年地级市层面数据进行建模和量化分析的稳健性检验结果,结论同省级层面分析类似。

表10 以2017年为基准的市场一体化建设效应

单位:% ,个百分点

类型	城市化 率增长	GDP 增长	社会福 利增长	消费服务 就业占比	生产服务 就业占比	制造业 就业占比
区域一体化降低 劳动力流动成本	1.98	1.79	10.5	0.22	1.19	0.58
全国一体化降低 劳动力流动成本	2.44	2.6	13.3	0.28	1.50	0.67
区域一体化 同时改革	2.06	3.6	12.2	0.22	1.10	0.74
全国一体化 同时改革	2.87	25.0	36.2	0.34	1.03	1.50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区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发展区域经济是实现国家战略与奋斗目标的重要支撑。未来中国经济需要向更加协调、更高质量和更具竞争力的方向迈进,也将更加依托区域经济这一载体。在市场一体化建设过程中,需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因而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思路需要经过科学的量化评估和对比。为了量化估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多地区、四部门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表明:市场一体化建设会增加GDP和社会福利,能有效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在建设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区域间分工将继续深化,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会进一步向服务业转型。同时,本文比较了区域一体化和全国一体化的增长与福利收益差异,并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的赋能效应。

开展宏观研究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比较静态模型分析了一个重要的宏观发展改革问题,用以评估改革实施后的收益。我们暂且假设实际改革中会有一个随着时间变化的市场一体化成本,但是这个成本独立于空间一般均衡模型。相对而言,区域一体化成本比区域间一体化成本低,因为区域一体化需要的地区间协调成本较低,同时城市间政策、文化、距离等更接近。但是,给定市

^① 由于国家统计局在2011年后不再公布各地区分部门的就业人口数据,故本部分给出以2010年地区分部门就业人数代理2017年地区分部门就业人数的结果。

场一体化建设的成本,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不同部门间相互赋能作用和要素再配置效率越来越高,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收益将越来越高。本研究为区域一体化迈向全国一体化的渐进改革路径提供了依据,也指出了加快改革的紧迫性。同时,本文分析表明,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空间结构调整是一体两面的,两者都内生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伴随着空间结构调整,两者都是发展阶段变化的结果和表现,制度变化和发展阶段会相互作用。在客观规律的驱动下,即使一体化程度和相关制度不变,发展阶段变化也会带来经济和空间结构变化;如果制度能顺应经济发展阶段动态调整,则会产生更大的制度红利。在此过程中,全国的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制造业比重有所下降,这是经济现代化水平提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资源空间配置效率改善的表现。

本文的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第一,应进一步凝聚共识,畅通国内产品与要素市场大循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大的制度红利。中国式现代化要聚焦于国家长期、全局和多维的发展,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人口的适度流出也有利于提高其人均产出和居民福利。第二,要尊重市场规律,着力消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体制障碍,推动区域一体化向全国统一大市场转变。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和服务业的赋能效应变大,改革应在区域一体化建设的基础上,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获得更高的增长、社会福利改进和结构转型红利。当前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障碍仍然是长期存在的行政边界分割,尤其是省际边界分割。未来,需要加强体制机制建设,重点消除行政边界分割,具体的措施包括:在统计和考核上,削弱地方政府的辖区内GDP最大化和税收最大化的激励;在规划和建设上,用经济区(如城市群和都市圈)一体化机制统筹跨行政区的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共享。第三,区域发展战略从前一阶段的城市群建设,转向基于全国一体化的区域分工。事实上,产业同构问题不仅存在于城市之间,也存在于不同的城市群之间。当进入全国一体化发展阶段之后,不同的城市群也需要根据自身的地理条件、人才储备和产业基础进行更精准的定位,即使在同时发展的大产业门类内部,也要形成在细分领域内差异化分工发展格局。第四,市场一体化建设强化了区域间的分工协作,各地区应强化大局意识,以服务于国家发展为根本目标,充分做好准备,抓住市场一体化建设过程中的发展机遇。人口流入地区(尤其是大城市)更好发挥引领作用,在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发挥辐射整个城市群和全国产业的作用,更好地提供与人口流入相适应的公共服务,并且在建设用地指标和财政资金方面适应常住人口增长所需。而人口流出地则更多承担服务于国家战略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功能。在经济发展上,人口流出地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应更多发挥本地资源优势,粮食主产区、生态保护区和边境地区更好地发展文旅产业,在服务于本地居民需求的基础上,一些有特色的地区要服务于全国人民的文旅需求。在产业投资方面,要更注重发挥市场的力量,投资于本地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避免政府盲目投资。在人口流出的过程

中,如果经济规模和税收增长相对缓慢,则要着力提高本地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 才国伟、陈思含、李兵,2023:《全国大市场中贸易流量的省际行政边界效应——来自地级市增值税发票的证据》,《经济研究》第3期。
- 陈斌开、赵扶扬,2023:《外需冲击、经济再平衡与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基于动态量化空间均衡的研究》,《经济研究》第6期。
- 陈朴、林垚、刘凯,2021:《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资源配置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第6期。
- 陈诗一、刘朝良、冯博,2019:《资本配置效率、城市规模分布与福利分析》,《经济研究》第2期。
- 陈韬、闫中晓,2024:《国内市场一体化的规模经济强化效应——降低制度性贸易摩擦视角》,《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4期。
- 程宇丹、龚六堂、田文佳,2024:《工业用地出让、要素流动与地区间产出不平衡:基于地区间土地竞争的视角》,《经济研究》第7期。
- 韩峰、阳立高,2020:《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一个集聚经济与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的综合框架》,《管理世界》第2期。
- 韩佳容,2021:《中国区域间的制度性贸易成本与贸易福利》,《经济研究》第9期。
- 蒋为、倪诗程、吉萍,2024:《中国跨地区劳动力流动壁垒:测度方法、演进趋势与决定因素》,《经济研究》第4期。
- 李平、付一夫、张艳芳,2017:《生产性服务业能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新动能吗》,《中国工业经济》第12期。
- 李善同、何建武、祝坤福、张增凯、潘晨等,2023:《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1987-2017年》,经济科学出版社。
- 李自若、杨汝岱、黄桂田,2022:《中国省际贸易流量与贸易壁垒研究》,《经济研究》第7期。
- 林晨、李宇潇,2024:《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地方产业政策竞争》,《经济研究》第12期。
- 刘志彪,2001:《论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经济增长》,《中国经济问题》第1期。
- 陆铭、陈钊,2009:《分割市场的经济增长——为什么经济开放可能加剧地方保护?》,《经济研究》第3期。
- 陆铭、向宽虎、李鹏飞、李杰伟、钟粤俊,2023:《分工与协调:区域发展的新格局、新理论与新路径》,《中国工业经济》第8期。
- 陆铭、张航、梁文泉,2015:《偏向中西部的土地供应如何推升了东部的工资》,《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 汪泽、李荣林,2024:《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全球价值链国内链长扩张》,《国际经贸探索》第7期。
- 魏后凯、王颂吉,2019:《中国“过度去工业化”现象剖析与理论反思》,《中国工业经济》第1期。
- 吴涵、郭凯明,2023:《双循环视角下要素市场化配置、产业结构转型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经济研究》第9期。
- 徐朝阳、张斌,2020:《经济结构转型期的内需扩展:基于服务业供给抑制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 尹恒、李世刚,2019:《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空间有多大?——基于中国制造业的结构估计》,《管理世界》第12期。
- 赵扶扬、王都、戴若尘、陈斌开,2025:《跨地投资扭曲、产品市场分割与资本的空间配置效率——基于量化空间均衡模型的研究》,《管理世界》第6期。
- 张群、邱斌、孙少勤、易昱玮,2025:《鲍莫尔成本病再考察——基于开放经济与产业关联的视角》,《管理世界》第5期。
- 郑吉昌,2005:《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分工的深化》,《管理评论》第5期。
- 钟粤俊,2024:《大国产业结构:要素空间配置的影响》,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钟粤俊、陆铭、奚锡灿,2020:《受抑制的服务业:从人口空间分布看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管理世界》第

11期。

钟粤俊、奚锡灿、陆铭, 2023:《在集聚中减碳: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环境效应》,《世界经济》第10期。

钟粤俊、奚锡灿、陆铭, 2024:《城市间要素配置:空间一般均衡下的结构与增长》,《经济研究》,第2期。

周慧珺、傅春杨、龚六堂, 2022:《人口流动、贸易与财政支出政策的地区性配置》,《中国工业经济》第2期。

Adamopoulos, T., L. Brandt, J. Leight, and D. Restuccia, 2022, “Misallocation, Selection and Productivity: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with Panel Data from China”, *Econometrica*, 90(3), 1261—1282.

Banerjee, A. V., and E. Duflo, 2005, “Growth Theory through the Len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1, 473—552.

Burstein, A., and J. Vogel, 2010, “Globaliz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Skill Premium: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o. w16459.

Caliendo, L., and F. Parro, 2015, “Estimates of the Trade and Welfare Effects of NAFTA”,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2(1), 1—44.

Caliendo, L., L. D. Oromolla, F. Parro, and A. Sforza, 2021, “Goods and Factor Market Integration: A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the EU Enlarge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9(12), 3491—3545.

Chor, D., K. Manova, and Z. Yu, 2021, “Growing Like China: Firm Performance and Global Production Line Posi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30, 103445.

Eaton, J., and S. Kortum, 2002, “Technology, Geography, and Trade”, *Econometrica*, 70(5), 1741—1779.

Ferrari, A., and R. Ossa, 2023,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ubsidy Competition in the U.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24, 104919.

Francois, J., and J. Woerz, 2008, “Producer Services, Manufacturing Linkages, and Trade”, *Journal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and Trade*, 8(3), 199—229.

Gagnon, J. E., 2007, “Productive Capacity, Product Varieties, and the Elasticities Approach to the Trade Balan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5(4), 639—659.

Hao, T., R. Sun, T. Tombe, and X. Zhu, 2020, “The Effect of Migration Policy on Growth, Structural Change, and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13, 112—134.

Head, K., and J. Ries, 2001, “Increasing Returns versus Nation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s An Explanation for the Pattern of US–Canada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4), 858—876.

Henderson, J. V., D. Su, Q. Zhang, and S. Zheng, 2022, “Political Manipulation of Urban Land Markets: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14, 104730.

Herrendorf, B., R. Rogerson, and Á. Valentinyi, 2014, “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2, 855—941.

Hsieh, C. T., and P. J. Klenow, 2009,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4), 1403—1448.

Lu, M., Y. Suzuki, X. Xi, L. Xu, and Y. Zhong, 2025, “Pro–Manufacturing Land Policies of Competing Local Government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ina”, SSRN Working Paper, No. 4967319.

Rogerson, R., 2008,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European Labor Market Outcom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6, 235—259.

Tombe, T., 2015, “The Missing Food Problem: Trade, Agri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7(3), 226—258.

Tombe, T., and X. Zhu, 2019, “Trade, Migration and Productivity: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5), 1843—1872.

Zheng, Y., M. Lu, and J. Li, 2022, “Internal Circulation in China: Analyzing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Integration Using Big Data for Truck Traffic Flow”, *Economic Modelling*, 115, 105975.

Evolving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Empowering Effect of Producer Services

ZHONG Yuejun^{a,b}, XI Xican^{c,d} and LU Ming^{e,b}

(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b: Shanghai Institute for National Economy,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c: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d: Shangha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Economics;

e: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ummary: As the empowering effect of producer services strengthens, the building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ritical. Accelerating the building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for production factors, such as goods and labor, constitutes a fundamental pillar of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China has pursued a phased and incremental reform strategy, progressing from regional market integration toward national market integration. For a major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ing country like China, such incremental reforms are pragmatic. However, theoretical economic analyses of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remain relatively underdeveloped. Some key questions of concern emerge: How will market integration affect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Moreover, as China's economy reaches a higher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exhibits post-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why is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becoming ever more importan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recognizing the varying effects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enabling economic growth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can help understand the rationale behind gradual integration reforms better.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effects: (1) the structure of intermediate inputs, i.e., the importance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the input-output network; (2) sectoral linkage effects, i.e., the influence of producer servi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sectors. As development progresses,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for goods and factors becomes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as it facilitates a deeper inter-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generates greater efficiency and welfare gain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spatial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consisting of four sector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modes of factor and product market integration 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growth. Most importantly, it focuses on the empowering effect of producer services. We find that the benefits of market integration will expand as the development stage progresses, with the core mechanism being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empowering effect of producer services. Specifically, changes in input-output linkage mainly affect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while sectoral linkage effects primarily impact growth and social welfare. Quantitative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both regional and national market integration will increase national GDP and social welfare, effectively promot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further deepen the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However, as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roves and the empowering role of producer services strengthens, the structure, growth, and welfare effects of national integration will gradually surpass those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policy implication of this paper is that in the new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advance the shift from regional integration toward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1) Few studies have employed a spatial general equilibrium framework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simultaneously evaluated the empowering roles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and producer services, or examined how development stages shape integration outcomes. This paper fills these gaps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regional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elucidating the role of producer services. (2) By incorporating both non-homothetic preferences (embodied in a Stone-Geary utility function) and economies of scale into the analysis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highlights how integration drive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from goods to services and affects the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thereby enriching the literature 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3) Few studies hav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sectoral linkages and empowering effects from a spatial perspective, such as market integration.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is strand of literature. Furthermore, by comparing integration effects at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we demonstrate that as the economy develops and the empowering effect of producer services strengthens, the growth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utcomes of integration reforms are substantially amplified.

Keywords: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Producer Services; Empowering Effect

JEL Classification: R13, R23, R58

(责任编辑: 溯 明)(校对: 曹 帅)